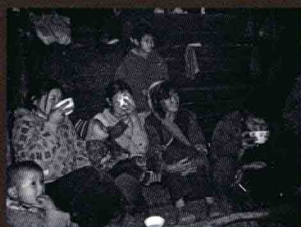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何明 主编



FEIWUZHICHUANYI
YIYANGTIANYETUXIANG

丙中洛阿怒民歌

FOLK SONGS OF THE ANUNG IN BINGZHONGLUO

何林 丁爱华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何明 主编

丙中洛阿怒民歌

Folk Songs of the Anung in Bingzhongluo

何林 丁爱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z h o n g l u 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丙中洛阿怒民歌 / 何林, 丁爱华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 何明主编)

ISBN 978-7-222-06045-6

I. 丙… II. ①何… ②丁… III. 怒族—民歌—研究—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IV. J607.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4723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何明 主编

首席责任编辑: 赵丁丁

装帧设计总监: 马 滨

电子媒体监制: 张力山 张 海

书 名: 丙中洛阿怒民歌

作 者: 何 林 丁爱华

摄 影: 何 林 吴晓惠 (按姓氏笔画排列)

责任编辑: 朱海涛 张力山

版面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责任校对: 闵艳平 玉波狄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24

印 张 7

字 数 50千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045-6

定 价 38.00元

Folk Songs of the Anung in Bingzhongluo

Abstract

Folk songs among the Anung people, as a form of cultural practice, not only bear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in aspects such as the narration of legends, offering of sacrifice, celebrations, education, amusement, marriage and love affairs, praise and so on) but have also received, and themselves express, profound cultural meanings in their capacity as symbolic entities. In the Bingzhongluo area of the Nujiang valley region of Yunnan, which is a multicultural (and especially multi-religious) context, Anung folk songs are characterized by multicultural features too. There are various types of Anung folk songs, including Banju, Kru, Yi, Man'gong or Wewe, Yimeng, Luole or Rila, etc. Among these, Banju embodies and transmits through singing (as the primary form and source of folk songs) essential concepts among the Anung that lie at the core of their culture. Kru focuses on the express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various structures and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Anung culture. Both Banju and Kru carry and express symbolic meanings and social functions as necessary elements and carriers of culture, and in some sense are characterized by each other.

Owing to its own limitations, Banju is now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on accoun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among the Anung. Kru and other songs which originated from Tibetan songs in Deqin County have become the dominant form of folk songs in actual use, but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same problem — namely, the impact of contemporary pop music and religious music. Since the 1950s these have included songs prais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man Mao as well as the new China and the reforms and opening up of the country. From the 1980s themes included local scenes and love — again, greatly characteristic of the times. After the 1990s both Roma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hymns were added as new elements to the family of Anung songs and these have become the major or even the only type of songs for some religious believers.

In a multicultural context, elements of other folk songs — Tibetan songs for instance — have been absorbed into those of the Anung but their primary structures are based on the Anung culture and are made into one cultural body through a long-term proces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s a result, they have greatly enriched folk songs among the Anung instead of undermining their indigenous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religious beliefs, Lamaists have received Anung traditional activities in their entirety and Catholics also accept and participate in most of them; Protestants never intervene but also never participate in any of the singing and dancing. As Anung folk songs embody mult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a concentrated form,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folk songs is also an interpretation of Anung culture itself.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书系序言

为精神家园守夜

何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①积淀着人类的历史记忆，表征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建构着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迅速推进，把或隐或显地带有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现代性”商品、图像、技术、知识和思想在全球范围迅速扩散，悄然而迅速地吞噬与置换着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方化的同质性“世界图景”越来越明显而强烈的凸现出来，多样性的文化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与考验！

民众在行动，演绎出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大戏；国家在行动，推出一个又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知识界在行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成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作为以人类文化及其多样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和人类学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调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力军、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夜人”。

法国艺术大师罗丹曾说：“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长期穿行于山林田野之间并驻留于“他者”之中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以其特有的学科敏锐性不

断地发现鲜为世人所知的文化事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以亲临现场进行细致的参与观察和民族志撰写表述出来，使之成为“凝视”的焦点。“凝视”的后效在于：唤起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以自己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感到自豪，倍加珍惜与主动传承；拓展其他社会或群体的文化视野，产生文化震撼与尊重异文化，并转化为支持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

作为表征文化的符号系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深邃复杂的意义。若不做深入细致的阐释，人们难以理解其意义，也就无从感知与把握。“人类学写作本身就是阐释。”^②本套书系的作者们在对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过程性和细节性描述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意义阐释，以期增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进而推动保护实践的广泛有效展开。

以上便是本套书系编写的基本目的，也是表述方式选择的根本依据。

在文化多样性不断遭受现代性侵袭的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精神家园需要“守夜人”。我们愿意勉力为之！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三十二届会议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总则”第一条第一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②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第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目录

丙 中 洛 阿 怒 民 歌

Folk Songs of the Anung in Bingzhongluo

概况：阿怒人与阿怒民歌 / 001

关于阿怒人 / 001

阿怒的生存环境及本书所涉田野范围 / 004

阿怒民歌概况 / 012

阿怒“本曲” / 021

“本曲”的文化意义 / 024

“创世本曲” / 039

其他“本曲”（小调） / 045

阿怒“可汝” / 051

“可汝”的文化意义 / 053

建房“可汝” / 072

婚姻“可汝” / 081

其他“可汝”调 / 092

目录

丙 中 洛 阿 怒 民 歌

Folk Songs of the Anung in Bingshongluo

其他民歌形式 / 109

“仪” / 109

“满工” / 116

“易蒙” / 124

“罗勒”或“日拉” / 132

其他歌谣 / 133

余论：关于新民歌 / 145

参考文献 /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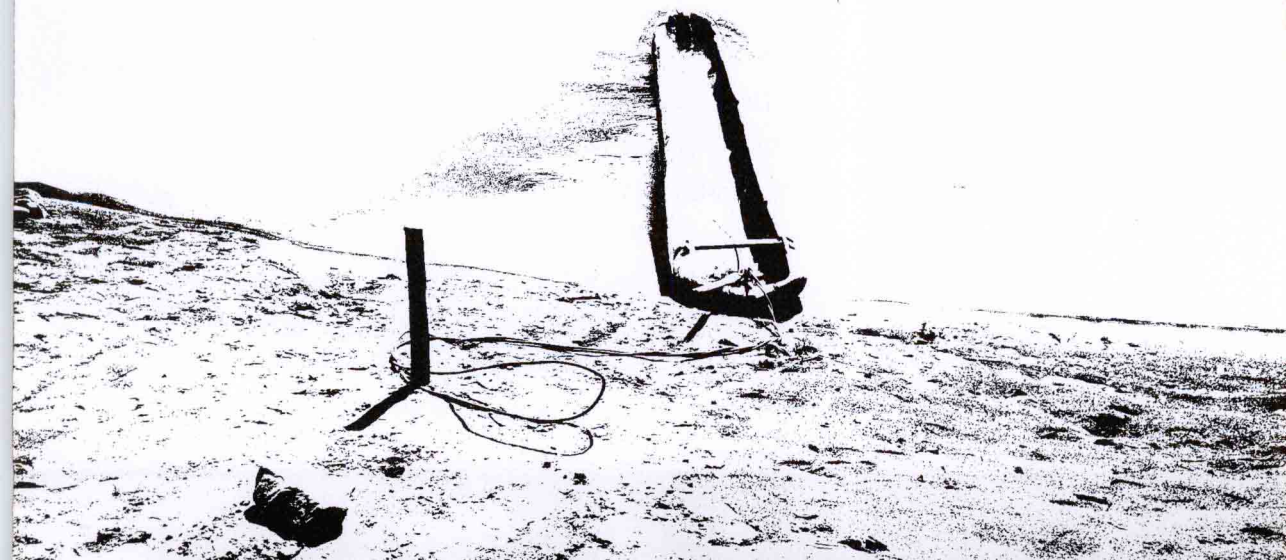
后记 / 152



概况：阿怒人与阿怒民歌

关于阿怒人

阿怒“创世纪”里说，洪荒过后得以存活的兄妹俩先后生下了九对男女，由父母分配到天下的九条大江，于是成了九个不同的民族。其中年幼的一对在襁褓中来到现在的怒江，跨过怒江的时候他们不停地喊着“怒（nuŋ⁵⁵）、怒、怒”（“怒”的发音在阿怒语中有“奶”或“吃奶”之意），于是父母就把这对要奶吃的儿女叫做“阿怒（a³¹nuŋ⁵⁵）”，怒江“阿怒日美”（a³¹nuŋ⁵⁵rə²²me⁴⁴）也因此得名。



①由于碧江县于1986年12月撤销县建制，所属5乡分别并入福贡、泸水县，“诺苏”或“怒苏”人的主要聚居地匹河乡现属福贡县。

②怒族简史编写组：《怒族简史》，第1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笔者注：根据田野调查情况以及与部分地方本民族知识分子达成共识，对部分怒族的自称作了适当修正：将福贡上帕、鹿马登怒族修改为“阿依”，贡山怒族修改为“阿怒”，其余不变。

③数据为2004年12月10日的统计资料，资料来源：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始的民族识别(1950年起)所确定的怒族主要分布在今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所辖的四个县(泸水县、兰坪县、福贡县和贡山县)，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即“诺苏”(no³⁵su⁵⁵)或“怒苏”(nu³⁵su⁵⁵) (也称碧江怒族^①)、“阿依”(a³¹noŋ³¹) (也称福贡怒族)、“若柔”(zo³³zo³¹)、“阿怒”(a³¹nun⁵⁵) (也称“贡山怒族”) ^②，他们在族源、语言、自称以及其他文化特点上差别较大。“诺苏”或“怒苏”现主要居住在福贡县匹河怒族乡、子里甲乡一带，人口13100多人(2007年)；“阿依”主要分布在福贡县上帕镇、鹿马登乡河架底乡，人口5900多人(2007年)；“若柔”主要居住在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兔峨乡和泸水县鲁掌镇，人口3800多人(2007年)；而自称“阿怒”的怒族主要分布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2007年人口为6296人，占全县人口3513人的17.8%^③，其中以丙中洛乡最为集中。此外，居住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察隅县察瓦龙乡的松塔、龙普两个自然村的怒族与贡山怒族(阿怒)使用同种语言，自认同族，他们自称门浪(mə³¹lai³⁵)，共400人(2008年，笔者统计)。

一般认为，阿怒是怒江北部地区最古老的居民，其进入怒江流域的时间较其他民族如傈僳族、藏族要早。据有关史料记载，现居怒江的各民族，包括傈僳族、独龙族、阿怒以及怒族的其他部分同为远古氏羌系统乌蛮部落



中的“施蛮”、“顺蛮”（唐代的称呼）的后裔，由于迁移到怒江流域的时间和路线不同，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内地到怒江流域的道路就局限于几条线：在北，自菖蒲桶^①过怒江，越碧罗雪山至叶枝，渡澜沧江经康普至维西；其南，自知子罗越碧罗山，在营盘街渡澜沧江至兰坪；又南，从老窝、鲁掌、六库等地，经漕涧渡澜沧江至云龙（县）；又从怒江两岸各地沿江而下，至保山、腾冲。阿怒及独龙族的祖先早于傈僳族的祖先沿北部路线迁移到怒江边居住（约为唐代以后），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也被称做“卢蛮”、“潞蛮”或“麓蛮”等，元朝以后居住在怒江的部分逐渐以“怒”取代了“卢”，到明清时期被称为“怒子”，而迁至独龙江的部分由于与北部西藏藏族交往而被称为“曲蛮”（“曲”在藏语中有“江”之意，“江”指今独龙江，缅甸境内恩梅开江的上游），后被傈僳族称为“俅帕”（“俅”即藏语的“曲”，“帕”在傈僳语中为“人”之意），即今天的独龙族。《元一统志》中记载：“丽江路，蛮有八种：曰麽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另一支“卢蛮”从中路和南路迁移至怒江流域，最后分化为傈僳族和福贡、碧江两地的怒族。^②丙中洛全区原为阿怒聚居，清代由于受到北部藏族及南部傈僳族势力的挤压，聚居村落主要集中在南部的双拉和北部的秋那桶地区，其余多与藏族、傈僳族等民族杂居。

① “菖蒲桶”为今贡山县在清代及至民国22年（1933年）以前的称谓。参《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第21页，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民族出版社2006年9月。

② 高志英：《唐至清代傈僳族、怒族流变历史研究》，载于《学术探索》2004年第8期。

① 王叔武：《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载于《民族调查研究丛刊·民族研究文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1987年6月。有的学者认为阿怒和现在的独龙族与景颇族有同源关系，因而采用“景颇语支”，也有的学者直接使用“怒语支”，目前还颇有争议。

② 孙宏开编著：《独龙族简志》，第189页，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③ 洪俊：《独龙族源初探》，载于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至二十辑摘编（上卷）第36页，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④ 洪俊：《独龙族源初探》，载于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至二十辑摘编（上卷）第48页，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阿怒人使用阿怒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①，与独龙族语属于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②，没有文字，拥有几乎相同的传说，极其相似的民间信仰和习俗，而且独龙族中还流传着许多来自怒江的传说^③。贡山怒族（阿怒）与独龙族较近的同源关系已经得此两个族群的认同和学界的共识，其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所处地理位置及生存环境相异，阿怒在怒江与藏族、傈僳族的交往以及近代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外，由于其语言、民间信仰、生活习惯、有关“洪荒时代”和“兄妹结婚”的传说极其相似，婚姻制度基本一致，而且在1949年以前的调查中发现独龙族与景颇族都拥有“江木雷”和“木江”两个氏族，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阿怒、独龙族与景颇族的同源关系。^④现在由于与周边的傈僳族、藏族交往频繁，阿怒人几乎都懂傈僳语，部分懂藏语（主要是云南省德钦地区方言），越来越多的人精通汉语。

阿怒的生存环境及本书所涉田野范围

在云南省西北端，沿怒江有一条直接进入西藏自治区的通道，它属于滇藏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沿古道进入西藏区，眼前呈现出一派典型的干热河谷景象，而云南一侧因地处印度洋暖流和西藏高原冷空气结合部，雨量充沛，阴冷湿润。丙中洛的中心地带是怒江峡谷中一片珍贵的缓坡，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平地”，



自18世纪后期即开始种植水稻，较为富庶，它是从云南内地沿怒江线进入西藏的最后一个中转站，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察瓦龙地区的必需物资，大多在丙中洛采购，由马帮不断运送入藏。现在丙中洛至察瓦龙的公路已经通车（2004年10月1日通车），马帮运输已退居为一种补充方式。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貌风光，丙中洛曾被描绘为“世外桃源”、“香格里拉”，甚至“天堂”。然而丙中洛的意义不仅于此，而在于它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狭小的区域内承载了民族多样性、文化多元性，尤其是多种宗教信仰近距离和谐共存的典型特性。如果给丙中洛画一幅周边民族和宗教示意图，那么北面可以标注为西藏藏族与喇嘛教^①；东面是云南藏族与喇嘛教、天主教；南面是傈僳族与基督教（仅指新教，下同）；西面是独龙族与基督教、传统民间信仰。而丙中洛地区则拥有所有这些民族与宗教信仰的存在。

以丙中洛“平地”为中心的狭长的峡谷地带北面连接西藏藏区，与属区的察瓦龙（乡）联系紧密，历史上还有一段渊源——清嘉庆初年丙中洛被康普女土千总禾娘连同独龙江上游地区一起赠送给察瓦龙米空寺，并由门工土千总收取“超度费”；西部翻越高黎贡山即进入独龙江，居民为信仰基督教或仍持传统民间信仰的独龙族，再往西则进入缅甸——曾是近现代史上怒江地区基督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策源地；东面阿路拉卡山顶的居民主要是从德钦县



往来于阿路拉卡（碧罗雪山的部分）与丙中洛的藏民马匹。

① 传播于云南省贡山县丙中洛地区的噶玛噶举派藏传佛教（俗称白教）被当地群众称为“喇嘛教”。为便于描述，本文以下均使用“喇嘛教”指代噶玛噶举派藏传佛教。

迁移至此的藏族天主教徒，再往东即是“白汉洛教案”的发生地迪麻洛河谷，居民主要是信仰天主教或喇嘛教的阿怒和藏族，他们与丙中洛的联系十分紧密，往来频繁，再从迪麻洛翻越碧罗雪山，则可到达云南藏区德钦县及其南部的维西县，不仅是云南藏传佛教传播的核心地带，同时也是近代天主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往南主要是信仰基督教的傈僳族、怒族等民族居住的峡谷地区。沿着被誉为“福音谷”的怒江峡谷北上，从下段的泸水经中段的福贡至上段的贡山，伴随着沿途不同民族群众服饰上的变化，风格相似的基督教堂不时出现。但自贡山县城茨开镇往上，则开始出现天主教堂，进入丙中洛的门户双拉—茶腊地区，狭长而深邃的峡谷里，江西（怒江西岸）半山上的双拉基督教堂与江东（怒江东岸）半山上的茶腊天主教堂隔江相望；过了“怒江第一湾”就是丙中洛的中心区，峡谷的空间突然变的开阔了：激发宗教思维的雪山、洁净而带着雪山清凉和野花芳香的“天堂的气息”、林间草地上吃草的牛羊、悠扬的牧笛声、教堂的钟声与喇嘛寺的诵经声组成的乐章、清心洁脾的翡翠一样的江水、雪山绿水间忽然出现的如海市蜃楼般的村庄，绿荫的青稞田围绕的石板房上的袅袅炊烟……丙中洛北部从碧绿的江水到高耸的雪山，相距数里的地方，依次矗立着天主教堂、喇嘛寺、基督教堂；阿怒人的石板房子前后，经常地点缀着作为喇嘛教信仰标志的祭坛“松塔”及耸立的风玛旗“喇策”，这些标



双拉基督教堂与茶腊天主教堂
隔怒江相望。



怒江峡谷中的茶腊、双拉地区。



白塔与天主教堂。

① 洪俊：《独龙族族源与传说》，《民族学》1992年第2期。
另据其他学者调查，独龙江也流传此传说。

志与十字架和圣母像交替出现，甚至在同一屋檐下，人们同吃一锅饭，却各信其主……

丙中洛乡位于贡山县的最北端——东经 $98^{\circ}23' \sim 98^{\circ}42'$ 、北纬 $27^{\circ}51' \sim 28^{\circ}31'$ ，乡政府驻地丙中洛村距县城44公里，现已修通了柏油路面，至县城约90分钟的车程。丙中洛乡因乡政府所在地丙中洛村而得名，全乡包括4个村公所，即秋那桶村公所、甲生村公所、丙中洛村公所、双拉村公所。“丙中洛($pi^{22}d_{3on}^{44}$)”为藏语地名，意为“藏族的村子”，阿怒语称“满别可垄($man^{22}pe^{35}kron^{13}$)”，含义与藏语名相同。丙中洛村原为阿怒人居住，在喇嘛教传入以后这里的阿怒人为了逃避喇嘛寺的赋税而迁移至独龙江地区（现贡山县独龙江乡甲贡村），成为现在独龙族的一部分。^①丙中洛地区包括北至西藏自治区的边界，南至现捧当乡的捧打村，东接云南藏区的迪庆州，西连独龙江乡，现丙中洛乡的总面积为823平方公里，但有人居住的地区主要是狭长的怒江峡谷地带。至2004年末，全乡总人口6205人，其中阿怒3159人，占50.9%，傈僳族2027人，占32.6%；藏族520人，占8.4%；独龙族305人，占4.9%。根据丙中洛乡政府2005年10月的统计数字，全乡共有天主教堂5座、喇嘛教活动场所2个（包括位于丙中洛东风村的喇嘛寺一座，丙中洛日当村喇嘛教活动点1个）、基督教堂6座，全乡人口6205人中，信教人口3808人，占总人口数的61.37%。其